

北宋东南钱荒缘由考辨

丁涛

【摘要】北宋钱荒不是全国性的，而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北宋东南钱荒有经济发展和货币流出两方面的原因。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使该地区的粮食产量和农田面积都大幅增加，粮食市场和土地交易规模也相应扩大，因此需要更多货币来满足市场需求。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货币征收高而财政支出低，致使东南地区向京师缴纳的货币留在北方而未能回流。东南地区还是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大量货币从东南地区流向海外，使货币进一步减少。此外，北宋政府限制货币在各区域间自由流通，货币壁垒是东南钱荒的更深层原因。

【关键词】北宋 东南地区 占城稻 货币调控 钱币外流 货币壁垒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8)12-0039-8

所谓钱荒，是指流通领域内的货币相对短缺。钱荒是一种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会导致物价下跌，使生产经营的利润下降，进而引起经济的全面衰退。近些年来，关于北宋钱荒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多对北宋钱荒进行总体研究，而对各区域进行研究的成果还较少。中国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各区域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要正确认识某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状况，进行区域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北宋钱荒并不是全国性的，而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因而对北宋时期的东南钱荒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北宋东南地区包括淮南路(熙宁五年析为淮南东路和淮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等地，常被称为东南地区或江湖地区。其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北宋东南地区的货币主要是铜钱，虽然宋代白银逐渐货币化，但直到南宋初白银货币化才初步实现，而交子又主要流通于川蜀地区。已有学者指出北宋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熊燕军说“从文献记载来看，北宋钱荒也主要集中在东南诸路”，“而当时的西北边地，不仅没有钱荒之虑，反有钱多之忧”¹。葛金芳、常征江认为“钱荒现象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在北宋都城开封和西北沿边诸路，是没有钱荒现象的”。由于史料确凿，学者们的观点是可信的。至于东南地区钱荒的成因，学者们多将其归结为赋税征收、销币铸器、民间私贮等方面。然而，以上因素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而不只是出现在东南地区，因此，北宋东南钱荒必有更深层的原因。

一、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

既然钱荒是货币数量相对于商品经济的短缺，那么探讨钱荒的成因就要从商品经济和货币数量两方面来考察，缺一不可。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使得该地区的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这是钱荒发生在东南地区的原因之一。

东南地区是中国传统的稻作区，“宋代以前江、淮、浙普遍种植的是一季晚粳，而没有真正的早稻”¹。粳稻对土壤肥力和水

¹ 作者简介：丁涛，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69。

郑飞：《近 20 年来宋代“钱荒”研究学术史回顾》，《邢台学院学报》2011 年第 3 期。

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年，第 3 页。

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86 页。

熊燕军：《结构性供需失衡与北宋钱荒》，《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

葛金芳，常征江：《宋代“钱荒”成因再探》，《湖北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

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分的要求很高，适宜种植于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区，一旦遇到干旱灾害，就会大幅减产。大中祥符四年(1011)，“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蒔之，盖旱稻也。”占城稻原产于越南占城，具有耐旱的优点，北宋初年传入福建。为了解决江南、淮南、两浙等地“稍旱即水田不登”的问题，宋真宗派人到福建取占城稻种在东南地区推广。与粳稻相较，除耐旱外，占城稻还具有其他方面的优势。南宋舒璘曾对粳稻和占城稻做过详细对比，他说：“有大禾谷，有小禾谷。大禾谷，今谓之粳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小禾谷，今谓之占稻，亦曰山禾稻，粒小而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所谓粳谷者，得米少，其价高，输官之外，非上户不得而食。所谓小谷者，得米多，价廉，自中产以下皆食之。”通过舒璘的比较可见，粳稻的特点是“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得米少”，即对土壤的要求高却产量低。与此相反，占城稻的特点是“不问肥瘠皆可种”“得米多”，即对土壤的要求低且产量高。与粳稻相比，占城稻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此外，占城稻还具有生长周期短的优势，粳稻的生长周期大约需要 180-200 天，而占城稻的生长周期则只需要 110 天左右。因此，种植占城稻可以提高农田的利用率，农民在收获占稻之后，还可再种植蔬果等其他农副产品。由于占城稻生长周期短，东南地区还培育出了双季稻，南宋吴泳《隆兴劝农文》载：“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蚕一年八育。”吴泳所谓“稻一岁再熟”即一块农田一年收获两次稻谷，可见最晚在南宋时东南地区已经出现双季稻。

由于占城稻具有耐旱、不问肥瘠皆可种、得米多、生长周期短等优势，自宋真宗遣使取种以来，占城稻在东南地区迅速传播，在种植面积上很快就超过了原来的粳稻。李纲在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1135-1139)时曾上奏说：“缘本州管下诸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本司契勘，本州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李纲所谓“早占”“早占米”皆是指占城稻，所谓“大禾”即粳稻。根据其奏可以看出，南宋初年江南西路的占城稻种植比例已经达到 70%，远超过粳稻的占比。南方其他诸路的种植情况和江西差不多，“荆湖南、北路虽然不是真宗命令栽培占城稻的地方，但是其后这种稻从江西方面引进栽种”²曾雄生指出“占城稻引进以后，在江西、福建、浙东，以及后来的湖南、湖北、广东一带的种植面积很大，原有的一季晚粳稻大部分为一季早稻所取代”。总之，由于占城稻具有明显的种植优势，自宋真宗在东南地区推广以来，占城稻得以迅速传播，很快就成了东南地区的主要种植作物。

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使东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首先，占城稻耐旱和不问肥瘠的优点使东南地区的可耕种面积迅速扩大。与华北平原不同，东南地区平原狭小而丘陵较多，粳稻多种植在水土肥美的狭小平原地带，而占城稻可以种植在广泛的丘陵地区，因此，占城稻的推广使东南地区的可耕种面积迅速扩大。漆侠曾对宋代各区域的垦田面积进行过研究，指出“在垦田数量上，南方诸路更是远远超过了北方”。北宋南方诸路垦田面积的大幅增加，与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是分不开的。其次，与粳稻相比，占城稻还有“得米多”的优点，即单产比粳稻高。因此，在种植面积和单产量双双提高的共同作用下，东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出现在占城稻在该地区推广之后。随着占城稻的推广，东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该地区的粮食交易规模也相应扩大，若货币数量不能相应增多，那么必将会出现钱荒现象。司马光曾上奏说：“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宜秔稻，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采取以供京师，则无所发泄，必甚贱伤农矣。”³司马光指出了东南地区粮食过剩而钱币不足的问题，主张朝廷在东南地区采购粮食，使货币流入并使粮食泄出，以调控东南地区钱币和粮食失衡的局面。若任由该地区粮价下跌，必将打击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进而伤害到农业生产。

占城稻在东南地区的推广，不仅使粮食产量大增，还使农田面积大幅增加。北宋实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农田不仅是生产资料，还是重要的大宗商品。农田面积的大幅增加，使土地交易规模相应地扩大，粮食交易市场繁荣，因此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满足交易需求。在市场经济繁荣的情况下，如果货币不能相应增多，那么东南地区必将出现钱荒。下文将分析货币方面的原

²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416 页。

舒璘：《舒文靖公类稿》，扬州：广陵书社，2006 年，第 6473 页。

关于占城稻与粳稻的生长周期，参见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吴泳：《鹤林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纲：《梁溪全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192 页。

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68 页。

脱脱等：《宋史》，第 4244，幻 56 页。

因。

二、北宋政府货币调控失衡

东南地区出现钱荒，北宋政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北宋政府对全国货币的调控方式是通过征税将各地财物汇聚于京师，即“粟帛钱币咸聚王畿”，然后再通过财政支出使税收和新铸货币分散于四方。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货币征收高而财政支出低，使东南地区的货币持续流向京师，这是东南地区出现钱荒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货币征收，东南高于北方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的货币征收比例远高

于北方诸路。北宋田赋制度，沿袭唐代杨炎所创立的两税法，按夏、秋两季征收，包括实物税和货币税两大类。由于东南诸路远离京师，运输成本高，故北宋政府倾向于从东南地区征收货币而从北方征收实物。在征税过程中，政府常将实物折合为货币，即所谓“折变”。包拯曾对折变问题有所论述，指出“盖祖宗之世，所输之税只纳本色，自后以用度日广，所纳并从折变”。折变现象在东南地区尤其严重，包拯曾连上四封奏折请求免除江淮两浙的折变，指责当地官吏“一面抑令人户纳元估价钱，不许纳本色斛斗。以致豆、麦益贱，钱货难得，下等人户尤更不易”³江淮两浙的官吏将百姓需缴纳的豆、麦等实物折成货币，不许百姓缴纳实物而只收取货币，致使江淮两浙等地出现钱荒现象。包拯对当地官吏的做法非常不满，请求朝廷禁止此举。张方平也对东南折变现象有所讨论，指出：“去年以恭谢大礼，亦是于江湖六路将斛斗五十万石，折钱五十万缗，起发上京。”⁴张方平指出朝廷曾因恭谢大礼将东南六路的五十万石粮食折合为五十万缗钱币运往京师。苏辙对此也有所论述，指出：“江湖诸路，自来皆系出米地分，而难得见钱。旧日官岁余米，钱散于民，故农不大伤，无钱荒之弊。今发运司以所余米代供，而责钱于诸路；诸路米无所售，而敛钱以偿发运司，则钱日益荒，而农民最病。此东南之大患也。”⁵苏辙指出过去在东南地区采购粮食，使钱币流入而粮食泄出，不会出现钱荒问题，而今，发运司在京师附近采购粮食而令东南地区缴纳货币，致使东南地区发生钱荒。总之，北宋政府倾向于在北方征收实物而在东南地区征收货币，致使东南地区的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向北方，长此以往，东南地区发生钱荒在所难免。

王安石改革致力于推进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使东南钱荒进一步加剧。美国学者万志英指出：“王安石为相期间，货币收入大约占到了全部财政收入的40%。王安石的经济政策招致了普遍的非议。因为他不管农民愿意与否，都把他们推向市场参与交换。农户只有出售自己生产的一部分农产品，才能获得货币，履行用货币纳税的义务。”东南地区向来钱荒，王安石改革使东南地区货币加速流出，使钱荒进一步加剧。苏辙曾对王安石变法之后的东南钱荒有所议论，云：“然方是时，东南诸郡苦乏钱，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多私铸小钱，有无不交。”⁶苏辙指出熙宁之前东南地区就有钱荒之患，自熙宁变法之后，由于百姓要缴纳免役钱、常平息钱等，使东南地区的货币都进入官库，出现国库充实而民间无钱可用的局面。

（二）财政支出，北方高于东南

各地税收及新铸货币咸聚京师之后，北宋政府还要再将货币分散到地方。由于古代没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北宋的货币供给不是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而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流入各地。北宋财政在各地的支出是不平衡的，在北方地区的支出远远高于东南地区。

北宋财政支出主要有军费、官俸、祭祀、岁币、赈灾等各种费用，其中军费支出占最大比重。北宋实行募兵制，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禁军和厢军皆是招募而来，军队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财政承担。北宋战争频繁且强敌环伺，这就使得北宋政府

³张田编：《包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5页，第86页。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46页。

苏辙：《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7页，第670页。

（美）万志英：《11-18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王文成译，《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

不得不保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蔡襄曾对当时的军队数字有所记录，载：“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共计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蔡襄指出当时禁军人数约七十万，厢军人数近五十万，合计近一百二十万。今人对此也有研究，汪圣铎指出：“自太宗以后，宋朝禁军人数常在四十万以上，最高曾达八十余万，厢军则约三四十万，总数在百万上下。”百万大军的供养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中之重，汪认为“军费开支在宋朝财政中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在岁出总额中一般占半数以上，战争时期高达十分之七八甚至更多。”斯波义信也指出：“财政支出的分配率（份额）大致为：官俸 10%、吏禄 20%、兵廩 70%。”汪圣铎和斯波义信的说法可从蔡襄的奏文中得到印证。蔡襄曾对英宗时的岁入和军费进行过统计，得出结论：“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蔡襄指出军费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十之六七，这与汪圣铎和斯波义信的研究基本吻合。在另一篇文章中，蔡襄又云：“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人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一，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在这篇文章中，蔡襄指出养兵之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八成以上。虽然蔡襄两次统计的数字有所差异，但军费是北宋财政开支的重中之重是毋庸置疑的。

北宋军队在全国的分布极不均衡，分布于北方的军队远多于南方地区。首先，北方边境有辽和西夏两个强大的外敌，为了保障边境安全，大量兵力不得不常年驻守边关。其次，北宋都城开封地处平原而无险可守，为了保障京师安全，开封周边常年有重兵把守。而南方则无外敌之患，故不需要大量屯兵，这就形成了北方多而南方少的军队布局。据朱家源、王曾瑜统计，仁宗时南方驻禁兵仅有一百九十四指挥，北方则有一千七百二十指挥。其中开封府、京东西共九百八十三指挥，河北二百五十四指挥，河东一百六十指挥，陕西三百二十三指挥。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南方的屯兵数量大约仅为北方的十分之一，而且这还是东南诸路和川蜀、广南、福建等地的总驻兵量，东南诸路的驻兵量还要更少。可以说，与北方的驻兵量相比，东南诸路的驻兵量是微不足道的。军队所在，即军费支出所在。军队主要驻扎在北方，故北宋的军费支出也主要发生在北方。与北方相比，北宋在东南地区的军费支出是不值一提的。军费开支是北宋财政支出的主要构成部分，占一半以上的比重，因此，北宋的财政支出主要发生在北方地区。

综上，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的货币管控是失衡的。北宋政府在东南地区所征货币比例远高于北方，而在东南地区的财政支出又远低于北方，这就导致东南地区向京师缴纳的货币留在了北方而未能回流，使货币呈现单向流出状态。在货币管控失衡的状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地区的货币会持续流出，钱荒会愈演愈烈。

三、东南地区货币流向海外

钱荒之所以会发生在东南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地区乃是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在与日本、朝鲜、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等地区的海外贸易中，大量钱币从东南地区流向海外。

北宋时，大一统的阿拉伯帝国不复存在，中亚地区政治动荡，中国东北和西北出现了辽、西夏、高昌回鹘等多个割据政权。在中亚和中国北方政局混乱的背景下，我国与西亚、朝鲜半岛等地的传统陆路贸易路线受到影响，北宋政府积极开拓海上贸易，使东南地区成为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⁴自开宝四年（971）起，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三地设市舶司，与阿拉伯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进行贸易。所开辟的三处市舶司中，东南地区占了两处，即杭州和明州。“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⁵为了进一步拓展海外贸易，雍熙（984-987）年间，政府派人携敕书和金帛到海外招致外国商人前来贸易，并指定出海商人到两浙市舶司申请官券，由此可见北宋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程度以及东南地区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北宋海外贸易繁荣发展，大量海外

⁴ 蔡襄：《蔡忠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89 页。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第 400 页，第 395 页。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37 页。

蔡襄：《蔡忠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390 页，第 380-381 页。

朱家源，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第 24 辑。

脱脱等：《宋史》，第 4558 页。

货物从广州、杭州、明州等口岸进入中国。“皇祐中，总岁入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皇祐(1049-1054)时，每年进口的象犀、珠玉、香药等货物达五十三万有余，治平(1064-1067)年间，年进口量又增十万。虽然在进口的同时也有货物出口，但总体来看，北宋的对外贸易存在逆差现象，即货币从中国流向海外。《食货志·互市舶法》载：“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鼈皮、瑇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橘、苏木等物。”《食货志·互市舶法》对宋代进出口货物明细有所记录，进口明细包括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等，而出口明细则包括金银、缗钱、铅锡等。由此可见，在对外贸易中，货币从中国流向海外，即北宋存在贸易逆差现象。北宋朝臣对此也有议论，张方平指出：“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益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人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其极不可胜言矣。”刘挚说：“时或谓之钱荒，此何谓也？其故大者在泄之于四夷而已，……臣恐竭吾货财，穷吾工力，不足以给之。”张方平、刘挚等北宋朝臣都察觉到了货币外流的现象。

国际货币角色是导致北宋钱币外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北宋货币不仅通用于中国与外国的贸易，还通用于海外诸国之间的贸易，因此，对于北宋货币，海外各国都有强烈的需求。关于北宋货币的国际货币角色，学者们已进行过专门研究。黄纯艳指出：“宋代所铸的铜钱，在当时的海外诸国作为通行货币使用，需求量很大。如在高丽、日本和交趾，宋钱均作为主货币行用，即使在实行金银本位制的东南亚(交趾除外)以及印度南部沿海和阿拉伯地区，宋钱也担当着辅币功能。”美国学者万志英指出：“宋朝国力鼎盛的11世纪中，铜钱作为通用的基准货币，在市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支配地位。12-13世纪，宋钱还在东亚乃至印度洋的世界贸易中扮演了国际货币的角色。”海外诸国大量进口宋代货币的情况，还可以从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印证。据日本考古学界的发掘报告，在日本发现的大量中国钱币中，约有70-80%是宋钱，其中尤以北宋钱居多。美国学者贾志扬对日本与宋代的贸易活动进行过研究，指出：“日本人不但从中国和南海进口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也进口大量的宋代钱币，造成了通货膨胀(一些人称‘钱病了’)。这也引起日本当局的警惕，他们无数次地试图限制钱币的进口，但也是毫无效果。”由于大量进口宋钱，日本都发生了通货膨胀，可见当时宋代货币的流出量是十分庞大的。两浙路是北宋重要的通商口岸，大量货币从两浙流向海外，因此，在东南诸路中，两浙钱荒尤为严重。时人对两浙钱荒多有评论，曰：“浙中自来号称钱荒”，“两浙累年以来，大乏泉货，民间谓之钱荒”两浙钱荒尤为严重与该地区的贸易逆差是有关系的。

总之，在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中，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现象，致使货币大量外流。东南地区拥有杭州、明州两大市舶司，是北宋重要的贸易港口，也是货币流出的重要口岸。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货币持续从两浙流向海外，出现钱荒是不可避免的。北方地区则与东南有所不同，北方的贸易对象以辽国为主，在与辽国的贸易中，北宋不仅不存在贸易逆差，反而还存在贸易顺差。斯波义信在讨论辽、宋贸易时，指出：“宋代的出口额通常远超过它的进口额。平均来看，宋通过对辽贸易每年可获得八十万贯顺差。”⁵此顺差使宋朝基本赚回了给辽国的岁贡。在对外贸易中，东南地区产生贸易逆差，而北方却存在贸易顺差，这就使得东南地区与北方的货币不均衡局面进一步加剧，进而导致北宋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而不是北方。

四、东南地区与中原的货币壁垒

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国境内形成多个割据政权，它们各自为政，使用不同的货币，导致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陷于崩溃。北宋立国之后，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整顿货币的措施，但是却一直没有恢复全国统一的货币系统，东南地区与北宋朝廷所在的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货币壁垒，这是东南地区发生钱荒的更深层的原因。

⁵脱脱等：《宋史》，第4559页，第4559页，第4558页。

张方平：《张方平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刘挚：《忠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1-11页。

黄纯艳：《略论宋朝铜钱在海夕卜诸国的行用》，《中州学刊》1997年第6期。

(美)万志英：《11-18世纪中国的货币与货币政策》，王文成译，《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

李培浩：《宋代中日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

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51页。

郑樵：《郑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0页。

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北宋立国之初，东南地区还同时存在着南唐、吴越、荆南、湖南等割据政权。在统一东南地区之前，北宋政府禁止铜钱流入东南诸国，也禁止东南诸国之钱流入宋境。“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徙一年，五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江南钱不得至江北”北宋政府对于擅自向周边输送铜钱的行为判处严厉的罪行，输出两贯钱就要被流放一年，输出五贯钱则要被公开执行死刑。在平定东南之后，宋代政府也没有采取统一货币的措施，而是仍然延续旧令。“平广南、江南，亦听权用旧钱，如川蜀法”，在平定广南、江南等地之后，北宋仍令其使用旧钱，如同在川蜀实行的办法。

尽管北宋政府在后来对东南地区的货币政令有所调整，但东南地区与中原一直奉行着不同的货币政策，直到王安石变法期间都没有得到改变。熙宁五年，载：“既复罢铸当十二分之令，尽铸小平钱。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熙宁五年，政府命令在中原和东南地区统一铸小平钱，但同样的货币在东南和中原却代表不同的币值。一枚重宝钱在中原地区面值五文，而在东南地区的面值则只有三文。“旋复诏京畿、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熙河当十钱仍旧，两浙作当三，江南、淮南、荆湖作当五”⁶政府很快对该政令进行了调整，对小平钱在各地的面值进行了重新规定，一枚小平钱在中原地区的面值改为十文，在两浙依然是三文，在除两浙外的其他东南诸路则改为五文。由此可见，北宋东南地区与中原奉行着不同的货币政策。即使在东南诸路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规定，两浙路与其他诸路就有所不同。同一枚货币在各地代表不同的面值，意味着货币在各地具有不同的购买力，跨区域交易必然有利可图。为了抑制跨区域投机，北宋政府严格限制货币自由流通，在各区域之间设置了货币流通壁垒。

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管控货币流通的措施。北宋严禁商人携带货币赴外地，只允许使用官营汇兑来实现钱币的异地周转。载：“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钱诣务陈牒，即擎至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赏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开宝三年，政府设置便钱务，命令商人将钱存入本地钱库，凭券到异地支取。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宋朝廷可以限制货币在区域之间的流通。北宋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限制货币贩运的措施，载：“始令四辅、畿内、开封府许搜索舟车，赏视旧法增倍。水陆所由，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收纳不拣选、容私钱其间者，以差定罪法。”⁶朝廷准许京西南路、京西北路、京东路、京西路、京畿路、开封府等地方官府搜索商人的舟车，一旦查到私运货币，就对官员加倍行赏，若出现失察的情况，则罢免官员职务，若故意隐瞒，则按照数额多寡对官员进行定罪。总之，北宋政府对于钱币的跨区域流通具有严格的管控，虽然东南地区与中原同处于一国之内，但是两地却奉行不同的货币政策，钱币也不能在两地之间自由流通。

东南地区与中原之间的货币壁垒，是北宋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的重要原因。北宋时期，东南、中原、川蜀、西北等地奉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因此形成了多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区。由于各地区的人口、资源、产出等互不相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必然会出现不平衡，而货币在各区域之间又不能自由流通，因此局部地区会发生钱币过多或过少的情况。换言之，如果货币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东南钱荒、西北通胀这样的怪乱现象。

结语

钱荒在唐宋以后并不鲜见，但北宋钱荒却非常特殊，表现为钱荒并不是全国性的，而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钱荒是货币相对于商品经济的短缺，经济发展和货币减少都可能导致钱荒现象。北宋东南钱荒的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一方面货币持续流出。就商品经济方面来说，北宋时占城稻在东南地区迅速推广，占城稻具有耐旱、不问贫瘠、产量高等优点，使东南地区的农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大幅增加，进而导致土地交易规模和粮食交易市场繁荣发展，以至于需要更多货币来满足交易需求。就货币方面而言，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的货币管控有所失衡。与北方相比，北宋倾向于从东南地区征收货币税而不是实物税，但在东南地区的财政支出又

远不及北方，致使东南地区向京师缴纳的货币留在了北方而未能回流，使东南地区的货币量日益减少。另外，东南地区是北宋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大量货币从东南地区流向海外，使东南地区的货币进一步减少。在经济蓬勃发展和货币持续

⁶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375页，第4376页，第4388页，第4388页，第4385页。
脱脱等：《宋史》，第4389页。

减少的双重压力下，东南地区发生钱荒是难以避免的。然而，以上问题还不足以导致东南地区发生钱荒，致使东南地区发生钱荒的更深层原因乃是北宋政府设置的货币流通壁垒。北宋限制货币在各区域之间自由流通，因此，当东南发生钱荒时，其他地区的货币不能自由流通到该区域。北宋政府所设置的货币流通壁垒是钱荒主要发生在东南地区的重要原因。

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繁荣期，也是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为了应对经济蓬勃发展造成的货币短缺，北宋士大夫们进行了多项创举，譬如铸造“折三钱”“折五钱”，还印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些创举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北宋士大夫们并没有成功地解决货币短缺问题，东南地区长期存在钱荒现象。北宋东南钱荒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当时的很多历史事件都与此有关。再譬如北宋党争与东南钱荒也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南北方具有不同的经济形势，致使南北方士大夫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思想，于是在改革问题上就出现了对立意见。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与钱荒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进程多因钱荒而中断，钱荒使资本不能持续增加，还会导致物价下跌，进而影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利润的增长，最终导致经济全面衰退。北宋钱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只是抛砖引玉，还有大量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正如袁一堂所言，“这的确是值得今后继续加以研究的大题目”。⁷

⁷袁一堂：《北宋钱荒：从财政到物价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